

从“哲学复兴”到“民族复兴”^{〔*〕}

——论张岱年哲学的民族性

○ 张允熠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民族复兴需从“哲学再兴”做起,复兴民族哲学——这是张先生终生秉持的信念,也是他全部哲学活动的宗旨。如果离开了传承千年的民族精神,中国哲学便丢失了自己的灵魂;如果丢失了生生不息的哲学基础,民族精神也只能是一种游魂。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在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中,民族本位即中国本位必须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张先生的心目中,文化问题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他批判“全盘西化论”,提出在融会中、西、马的基础上综合创造出中国新文化的思想是毕其终生学力而铸成的文化通观。从“哲学复兴”到“民族复兴”,集中体现了张岱年先生哲学民族性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哲学复兴;民族复兴;民族本位;“全盘西化”

我读张岱年先生的书,除从诸如《中国哲学大纲》之类精湛的学术著作中受到教益之外,感受最深的是张先生字里行间中洋溢着的那种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和对中国新文化建构的深邃运思和广阔视野。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境遇中,在中外文化际会与多元思想歧出的背景下,再三捧读,对张岱年先生字里行间内所充满着民族精神即民族性,感佩至深。有几点心得,系之如下,以飨学界同仁。

一、“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体性”

张岱年先生出生于 20 世纪初,经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为救亡图

作者简介:张允熠(1951—),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哲学学院教授。

〔*〕本文是出席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 105 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论文。

存、保国保种而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的关键时期。张先生的哲学研究始于30年代,又恰值“9·18”事件爆发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践踏中华大地之时,可以说,张先生的学术生涯始于民族危难的旧中国,而硕果仅存于已走向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新中国。时代赋予了张岱年先生把学术事业和国家兴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责任意识。

张先生认为,哲学是思想的综合,因而在文化中占居领导的地位,成为文化系统的核心部分。一个民族即使国家被异族侵占了,如果其文化不亡,民族哲学相对于征服者处于优越地位,它仍然可以兴灭继绝,最后实现民族的复兴。中国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最终却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征服者被征服了,这就充分证明了军事上的优势弥补不了文化上的劣势。张先生说:“亡国有亡国的哲学,兴国亦须有兴国的哲学。颓废的思想可以促进民族之衰萎;有力的哲学可以激发民族的潜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1]“中国现在处处受帝国主义的束缚与宰制,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为所制限……所以现在中国假如还有再兴的希望,其第一步的表现必是哲学思想的之再兴。”^[2]把哲学复兴作为民族复兴的第一步,张岱年先生当年的这种观点确是独具慧眼,哲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奏,革命实践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用今天时尚的话来说,是国与国之间实力的较量,软实力更根本、更长久,它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发展潜力和赖以复兴的资源。民族的复兴需从民族的“哲学再兴”做起,这在血与火的年代,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复兴民族哲学——这是张先生终生秉持的信念,也是他全部哲学活动的宗旨。

据此,张先生再三指出:“今日中国的新哲学,必与过去中国哲学有相当的继承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更须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中生出来的。”^[3]唯有这种哲学,才能体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这个词,张先生在晚年常被提及,这相当于他早年时期学界流行的“国民性”、“民族性”的提法。张先生说:“我认为,谈到国民性,或者谈到民族性,也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一个民族必然有其延续发展的内在根据,必然有其独立存在的精神基础,这就是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也可以称为民族精神。”^[4]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如法国强调法兰西精神,英国讲盎格鲁·萨克森精神,美国讲美利坚精神,德国对民族精神更为重视,大讲日耳曼精神,日本也讲大和精神。那么中华民族就不能讲民族精神吗?我认为,我们也应肯定有一个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一要发现这种精神、认识这种精神、理解这种精神,然后发扬提高这个精神。”^[5]在张先生看来,民族精神只能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促进民族发展的价值,那些负面的、消极的、妨碍民族发展的价值则不能称为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哲学基础只能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中华民族的哲学,它与希腊哲学、欧洲哲学、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一样,都以其民族特色而标榜于世。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虽然有一些短处,如尚通忽别的致思心习、

不重实际探求的学术方向、忽视个性自由的人际关系、尊尊亲亲的传统陋习,等等,但是,相比这些短处,中国哲学的长处更明显、更重要。他把中国哲学的长处归结为四点,即:(1)摆脱神学独断的生命信念;(2)重视相反相成的思维方法;(3)肯定道德自觉的人格观念;(4)爱国爱族的牺牲精神。^[6]这几种长处的汇合,便凝聚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哲学基础。如果离开了传承千年的民族精神,中国哲学便丢失了自己的灵魂;如果丢失了生生不息的哲学基础,民族精神也只能是一种游魂。“事实上,西方的发达国家都重视本国的优秀传统,如英、法、德、意、美各国,莫不重视张扬其本国的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7]当西方国家如此重视和发扬他们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时候,中国人有什么理由自轻自贱地长他人威风而灭自己的志气呢?

张先生又用“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独立性”来代替“民族精神”的用词。如说:“文化是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服务的。观念变化的目的在于促进民族的发展,更应发挥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独立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民族之间的差别尚未消失之前,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是维护民族的独立。民族的独立与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沦为别的民族的文化附庸,也就必然丧失民族的独立性,沦为殖民主义国家的殖民地。”^[8]据此,张先生指出,任何民族都珍视自己的主体性,西方国家更不例外。他说:“现代西方国家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体性。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民族的主体性即是民族的主体意识,亦即民族的自觉能动性,其中包含民族的独立意识、民族的自尊心等等。一个民族必须具有一定的主体意识,才能具备在全世界中参加竞争的能力,对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9]张先生经常交替使用“主体性”、“自主性”、“独立性”几个词,从不同角度来强调民主精神的价值。如说:“民族的主体性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就是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民族的特色。一个独立的民族必须能够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如果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那么,民族的独立也就随之消失了。”^[10]这里,把“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民族的独立性”等同起来,含义非常深刻,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感,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从中深深感受到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张先生有时还用“共同心理结构”来诠释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并称之为“民族的精神支柱”。他把中华民族传统的共同心理结构概括为两点:一、对外有反侵略的传统。中国人民历来对外来的侵略不能容忍,“虽然,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过汉奸,但仅是少数,不代表传统的主流,而且遭到人民的唾弃”;二、对内反暴政反压迫的传统。中国人民历来对内部的暴政统治不能容忍,“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和有识之士,继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反对统治者的暴政,同情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据此,张先生指出:“以上两个方面的民族共同心理结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赖以延续的精

神支柱,今天仍应大大发扬。这个优良文化传统,可以用《易传》中的四个字‘自强不息’来概括。”^[11] 仅就“共同心理结构”来说,仅用“自强不息”四个字可矣,但就“民族精神”来说,还要再加上“厚德载物”四字。所以,张先生又说:“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提出一项见解,认为《周易大传》的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这只是用最简洁的词句来表示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这两句话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和丰富的理论含义,这需要加以解释。自强不息的哲学基础是重视人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厚德载物的哲学基础是重视整体的以和为贵的理论。”^[12]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分别从人本主义和人与万物的统一即宇宙主义的角度上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张岱年先生这种用传统哲学理念和成语来概括民族精神的做法,对我们当前理解和建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与“民族本位”

文化或哲学的“综合创新”是张岱年先生年轻时提出的一种中西文化观,晚年又对它做了进一步阐发、论证、充实,使之更加明晰化。“综合创新”思想与毛泽东提出的“批判继承”与“古今中外法”在心路上若合符节,张先生也充分肯定和吸收了毛泽东的“批判继承”观点,并使之与“文化的综合创新论”相互融合。

所谓“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即“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13],是张先生终其一生矢志不渝的事业。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14] 他在晚年则明确表明“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同时又提出:“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文化精粹的汇集。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思想的综合。”^[15]

跟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老一辈哲学家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同,张岱年先生早在20年代就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通过与当时西方各主要哲学流派比较之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伟大的哲学”,从此,便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他在《我为什么信持辩证唯物主义》等文章中,回顾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一再提起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哲学笔记》以及30年代李达翻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等著述给予了他很深的影晌。“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生命哲学、尼采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等作了比较,在比较之后,我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16] 他将这种“信持”贯彻一生,忠贞不渝,并将《费尔巴哈论》作为自己最爱读的书目之一向青年学者们推荐。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有些青年人

对于中国百年来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历史缺乏切身的感受和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研读,迷失了方向,甚至出现了全社会的“信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更有坚持原则的必要。我认为,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这些失误的根源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失误之一是个人崇拜。事实上,个人崇拜是唯心史观的表现,正是违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17]把“个人崇拜”作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失误的根源”,这种洞悉至今值得我们深思,“个人崇拜”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8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思潮的影响,有人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我深以为非。通过对于一百多年中国近代史的考察,我还是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8]须知,张先生这些针对80年代“信仰危机”所表达的看法,是写在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于全球范围内处于低谷之际,此时,他已是年近九旬的高龄老人了。当我们读到这些文字时,没有人可以怀疑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诚度。

张岱年先生在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新文化的民族本位性。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指出其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不仅存在着许多不适应时代精神的保守和封建主义的成分,而且从15世纪以后就开始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化了。因此,张先生一方面主张中国必须向西方开放,主动向西方学习,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他也强调决不能因为学习西方而放弃了民族本位的立场,忽视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早在30年代,他就睿智地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触,便易走入衰落之途。……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因受刺激而获得大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也有被征服消灭的危险。”^[19]由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是少数独立发达起来并传承至今的古老文明,在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中,民族本位即中国本位必须得到充分的体现。他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是一方面不要使中国文化完全为西洋所克服而归于消亡,要使中国仍保持其特色的文化;同时另一方面,又要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适应,使中国文化变成新的,而成为新的世界文化之一部分。也即是,固要吸纳西洋文化,却又要避免为西洋所同化;其吸纳西洋文化,要按着一种表准,但此表准是依中国文化之特性及现代的需要来决定的。换言之,即是要建设新的中国文化,既非旧文化,也非西洋文化之附庸。”^[20]这样,“中国本位文化”在张先生那里既与自由主义派的“全盘西化论”相对立,又与保守主义派的“儒家本位文化”的概念相区别。

本着这一理路,张先生在晚年阐发了“建设中国文化的新统”的思想。他认为:“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新统已经在建立之中。”那就是:“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应以唯物论与辩证法为主导思想。也就是说,新时代的中国哲学、唯物论与辩证法

应占主导地位。而新中国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综合。”^[21]

张先生这一关于建设中国文化“新统”的观点十分值得关注,它隐含着一些重要的思想价值:其一,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传统,甚至是正统;其二,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即必须与中国优秀的古代哲学相结合,才能形成中国新文化的主流。

先看其一:张先生在分析中国哲学的特征时一再强调:“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一个长久的唯物主义的传统。中国的古典唯物主义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唯物主义观点与辩证法观点经常密切结合的。在西洋古代哲学中,也有唯物主义与辩证观念互相结合的思想,那就是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但在赫拉克利特以后的西方唯物主义哲学中,辩证的因素就比较淡薄了。在中国哲学中,从周秦一直到明清,许多卓越的唯物主义者也是辩证法家。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中,辩证观念不是由唯心主义哲学家阐发出来的,而主要是由唯物主义哲学家阐发出来的。”^[22]这无疑是说:中国哲学本来就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而非它烁,这正是中国民族哲学的正统和主流。

次看其二:张先生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若干基本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通处”,它们是:第一,在唯物论方面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通之处;第二,在辩证法方面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相通之处;第三,在唯物史观方面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相通之处;第四,在社会理想方面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通之处。张先生指出,正是由于这些“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共同之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起了促进作用的”。^[23]他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原因。”这个“必然的原因”是什么呢?张先生指出,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传统哲学的实际内容,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条件,就会使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比较明确的认识”。^[24]显然,这个“必然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际内容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有利条件,也就是二者之间在哲理上的相似相通之处。张先生在这里道出了他本人以及“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即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义无反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文化心理动因,即,基于民族文化传统、出于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在哲学理念上认同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这种心路历程,张先生总结道:“马克思在中国能够顺利传播,有其政治的原因,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如饥似渴地寻求救国救民的有效方策,经过反复的尝试,别的途径都失败了,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才能取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斗争的胜利。这是中国近代史所充分证明的历史真理。”^[25]“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顺利,绝不仅由于政治的

原因。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是完全格格不入的,那必然不易被人们所接受,更不易迅速成为整个国家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26]“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虽然距离较远,但也有互相契合之处。从中西哲学的异同来考察,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相通之处,也就不难理解了。”^[27]

再看其三:张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综合创新”的思想主轴。他说:“马克思在一定国家的传播,必须与这一国家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在这一国家中取得革命的胜利。一个国家的实际不限于经济、政治的实际,也应包括思想传统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一个国家的传统哲学进行分析解剖,从而加以鉴别抉择,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8]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在张岱年先生看来,这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中一层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层含义而且是更深层的含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张先生无疑特别重视这一点。因此,他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29]只有这种结合,一方面可使居于指导地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新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可提升居于本位地位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品质。

张岱年先生还以历史上佛教中国化为例,旨在说明中国本位文化理应主动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和发展民族本位文化。他非常赞赏陈寅恪对佛教中国化的评价,陈寅恪曾说:“佛教学说能于我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张先生认为,陈寅恪的这几句话“非常精湛”,不失为一种“卓识”,因为,它“揭示了中外思想交流的基本准则。我们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其目的在于壮大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否定自己,贬抑自己。如果输入一种外来思想,其结果只能导致民族独立的丧失,民族精神的衰颓,那种外来思想就不是先进的思想了。陈先生‘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真可谓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精髓之言。”^[30]如果说,中国文化有一个“道统”的话,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正是中国本位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道统”,在这种“新道统”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辩证否定,又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由此可见,在张岱年先生“创造的综合”即建构中国新文化的运思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民族本位、民族主体性地位是不相矛盾的,不仅

不相矛盾,而且是浑然一体、难分难解的。因为这里有着充分必要的思想根据和理论前提。其思想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哲学传统的相通之处和共同之点;其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相融合。

三、持“民族自信”拒“全盘西化”

“全盘西化”是五四以来推崇西方文化的自由主义学派最早提出来的一种具有极端趋向的文化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必须师法西方,即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照搬西方模式和标准,推行全盘西方化。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话虽然具有某种情绪化,却反映了在“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一部分知识分子为医治百病缠身的旧中国而开出的一剂毒药。持“全盘西化”论者的队伍十分复杂,其中不乏有爱国之士,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一段时期内也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但不可否认,在持“全盘西化论”的群体中也混杂着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买办文人,他们有着很深的殖民地情结和民族自卑感。“全盘西化论”一经问世,就一直没有绝迹,并在不同的历史场景,因应不同的中外文化际遇而以不同的形式粉墨登场。如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全盘西化论”再次沉渣泛起,成分依然复杂。时至今日,“全盘西化论”及其变种形式在思想文化领域仍占有不容忽视的份额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其中某些极端观点已经成为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进行思想渗透的别动队。显然,对这样的一种“全盘西化论”必须保持警醒,因为它具有不加掩饰的政治目的。

张岱年先生早在30年代就与“全盘西化论”者进行过正面的抗争和辩论,曾写了《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一文,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一切“全盘西化”的立场。半个世纪后,他又面对新一轮的“全盘西化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归结起来,张先生主要在三个方面集中批驳了“全盘西化论”:第一,他认为“全盘西化论”违反了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事实上无法推行;第二,“全盘西化论”是一种丧失民族自信心的表现,忽视了民族文化的优长和特性;第三,少数“全盘西化论”者在骨子里充满着被殖民的情结,是一种奴化思想的表现。

先看第一点。张先生认为,“全盘西化论者不过是高谈理想,其实完全没有顾到现实的可能。”每一时代,都要有一个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存在。有同有异,求同存异。《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睽卦·象传》又云:“君子以同而异。”和而不同,同中有异,这才是学术发展的规律。^[31]然而“全盘西化论”要求文化全盘一律,千文一体,以一拒多,甚至丧失自我和根本,存彼灭己,甘愿被同化。这种绝对同质化的文化主张实际上背离了多元文化和谐一体的客观规律,究其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与西方相比,中国严重落后了。由于落后,于是遭受了民族的屈辱,出现了一次一次的革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对于传统

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于是反传统文化的浪潮涌起,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议论,以为必须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才能迅速赶上西方。但是事与愿违,全盘西化论只引起了思想的混乱,并没有成为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这主要因为,全盘西化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32]这是说,即使“全盘西化”论者的目的是好的,其客观效果未必就好,违反了文化的发展规律,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

再看第二点。张先生指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保守的、封建的和不合时宜的东西,对此必须加以批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宝贵的优点和长处,如果没有这些优长,中华民族何以能繁衍生息传承到今天?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对世界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创造出光辉的成果。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轫起过促进的作用。这是西方学者从培根以来所共同承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曾受到西方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的高度推崇,也是历史事实。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中国对于世界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真实情况。这是不可抹煞的。”^[33]然而,“全盘西化论”者全然不顾这些事实,他们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文化一无长处,即然西方比中国先进,那就照搬西方的好了,没有必要再保留那些千年不易的“老古董”。有人甚至呼吁把所有的线装书都“扔到茅厕里去”,提出全盘采用罗马字母以“废除汉字”……非此,中国文化没有出路。这完全是一种丧失了文化自信心的表现。张先生指出:“一个民族谋求文化的发展,更必须具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自信心,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只知匍匐于外国文化的影响下,甘心接受人家的‘同化’,这势必丧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而丧失了文化的独立性,必将丧失民族的独立性。”^[34]“丧失了民族的独立性,就沦为别的民族的附庸了。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35]在张先生的心目中,他一直视文化问题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再看第三点。在张先生看来,有的“全盘西化”论者无论在客观还是在主观上,其对民族文化都是有害的。这种人完全丧失了民族气节,他们鼓吹“全盘西化”论实际上流露了一种要求被殖民的奴才情结,宣扬的一种“奴才哲学”。^[36]这种西化论者不是不爱国,他们只是不爱自己的祖国,却爱西方的国家;他们不爱自己的民族,却爱西方的民族;他们“言必称希腊”,却鄙视自己民族的五千年历史;他们肆无忌惮地侮辱自己的母文化,“说什么中国传统思想中还没有‘真正的人’的观念,即还没有‘真正的人’的自觉。这也就是说,中国人还不够个‘人’。这是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无耻谰言,这不但表现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盲目无知,更表现了崇洋媚外的奴才心理。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竟会出现这种殖民地的奴化思想,这是令人骇怪的!”^[37]在张岱年先生眼中,“全盘西化论”不仅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形态,而且是一种中国式殖民地奴化哲学的典型版本。

由上可见,对待“全盘西化论”态度,张岱年先生几乎达到了一种疾恶如仇

的地步。然而,与那些一味反对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完全不同,张先生对待优秀的西方文化,始终抱有一种虚心向学的态度。他自幼读儒书出身,大学时代又潜心研读了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张先生是20世纪一位学贯中西和兼通中、西、马三家义理并能打通彼此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哲学家,他提出在融会中、西、马的基础上综合创造出中国新文化的思想决不是一时即兴的偶然心得,而是毕其终生学力而铸成的文化通观。由于“全盘西化”论是一种极端思潮,张先生批判这种甘愿做西方文化附庸的错误观念的初衷正在于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防止中国未来的文化发展走向不归的邪路,以使人类文明史上硕果仅存的中华文化不因“全盘西化”而毁于一夕一旦。

张先生早年曾说:“我们需要学术的独立,不作西洋的附庸。在哲学,须根据本国先哲思想之精粹,及现代世界思潮之大流,从新建立起一个伟大的系统,作知识及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同时,关于各门科学,亦须能迎头赶上,有独到的贡献,在世界科学界占一地位。必能如此,文化建设才算相当的成功。文学、美术,尤须有独特的性征、独到的精彩、只随步模仿,没有独立性,也足为民族之耻。”^[38]中国文化的未来,决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复兴儒学”,而是“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39]具体来说,就是“兼综唯物论、实证论、理想主义之长而成一广大深微的系统。”^[40]

时隔80多年之后,在西方各种文化思潮通过现代网络媒体大举涌进中国思想文化园地之时,在多元文化纷呈、各种新奇怪异的左右理论交汇喷涌的今日,重读张先生的这些话,愈加感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刻不容缓,意义深远而重大,更觉张先生的文化主张具有先见之明,光映未来。张先生著述中闪现着中华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和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追求民族独立和文化复兴的拳拳赤心,从上世纪30年代到世纪之交,从提出“哲学复兴”到“民族复兴”,集中体现了其哲学民族性的显著特点。张岱年——堪称我们这个时代民族精神的哲人典范!

注释:

[1][2][3][14][19][20][38][39][40]《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9、247、271、229、152-153、229-230、234、244、266页。

[4][5][8][9][10][11][23][24][25][26][27][28][29][35][36][37]《张岱年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9、451、233、261、261、253、265、269、263、263、264、263、334、249、90、56页。

[6][7][12][13][15][16][17][18][21][31][32][33][34]《张岱年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195-196、221、13、64、158、158、159、449、65、140、52-53、196页。

[22]《张岱年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30]《张岱年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66页。

[责任编辑:嘉 耀]